目　录

我参加昆明郊区（原昆明县）
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回忆
陆介福（ 1 ）
回忆我在玉案中学时的几件事　杨显忠（ 26 ）
掩护和救治红军伤员　刘和扬口述
李星光整理（ 32 ）
日本飞机首次轰炸昆明　苏培仁（ 37 ）
航空委员会第一飞机制造厂概况
杨承景整理（ 40 ）
日本飞机首次轰炸马街地区　苏培仁（ 50 ）
第五军在马街地区劣迹点滴　李文源（ 53 ）
李根源先生在普坪村　杨承景（ 56 ）
芦沟桥的烽火——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梁炳学（ 65 ）
国难经历回顾　王　凤（ 67 ）
昆明县立乡村师范学生救亡宣传活动
栗　德（ 72 ）
抗日战争中我在西山地区的花灯演出
张应富口述梁宝成整理（ 80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九四〇年我在龙潭　梁炳学（87）
抗日时期李根源驻普坪村　陈述英口述
梁宝成整理（88）
抗日时期范石生在王家桥　王志清口述
梁宝成整理（90）
抗日时期梁家河救亡花灯宣传片段
夏　祥口述
梁宝成整理（92）
抗日时期昆明电工器材厂的救亡活动
昆明电缆厂供稿（95）
抗日初期我的教学工作回忆　梁文龙（98）
回忆我的母亲　李　镌口述
王　凤整理（102）
西山地区部份村落抗日从军小统计
王　凤（106）
先父遗话　王文言口述
梁宝成整理（108）
忆1938—1939年抗日宣传活动
仿朱子斋调寄（沁园春）　梁炳学（110）
抗日挽怀四首　梁　德（111）
写史有感　王　凤（111）
马街发展概略　徐连祯杨承录（112）

也说“春城”的由来　徐振明(121)
我收藏的几张纸币　黄金言(126)
西山区电影发展史话　黄毓恭(133)
高峣今古　徐振明(138)
倪蜕　先生　杨承景(142)
西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概况
（辛亥革命以前）　邓德贞(147)
回忆董崇正老师　李实清(152)
劳动模范张国华事略　杨承景(155)
石鼻里考辨　徐振明(160)
鹤峰义学碑记　杨承景(164)
李春华先生事略　邓德贞(170)
绚丽璀璨的绿宝石
原昆明胜地海源寺、灵源别墅简介
杨凤岗(173)
马街“人行天桥”建成　卢　彪(182)
西山区政协首届委员名录　(186)
编后　(188)

我参加昆明郊区(原昆明县)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回忆

陆介福

我们这一代人，生逢二十世纪中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长期艰巨而英勇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纪元。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新篇章。为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我们有责任把自己在这伟大时代所经历的那怕是很小的片段，也应该如实的告诉后来者。使大家都知道自己所处现时社会的昨天。更珍惜热爱今天，决心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一切；由于我自己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时间很短，经历的事情不多，接触的范围也小，又处于地下斗争环境，当时很多情况不可能全面了解。如今又事隔三十多年，记忆有限，难免有挂一漏万和错误之处，希望当时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

批评指正。

（一）解放前昆明县的概况

昆明是云南省首府所在，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祖国西南边陲重镇，原昆明县是围绕昆明市的郊区。这里居住着汉、彝、白、回、苗等五个兄弟民族，共有十九万一千五百多人口，九百五十多个自然村。在行政上分设官渡、珥琮、板桥、龙泉、莲德、太池六个镇，和玉案、北新、灵源、西郊、东波、苍竹、三合、云卫、普自、义仓等十个乡。整个昆明是云南省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一向是省的首脑人物的亲信爪牙直接控制，依靠各乡、镇土豪劣绅实行严酷的反动统治。经济上各族广大人民以农业为主，但是，广阔的土地，大部份是属于地主豪绅和城市官僚资产阶级所占有，还有一部份是庙产和公田。广大农民虽然世世代代耕耘着肥田沃土，终年辛勤劳动打下粮食，除了交租、纳税所剩无几。不少农户连温饱都难以维持。所以，很多城郊的农民，常年进城卖苦力，当帮工、挑脚担、拉黄包车，挣点钱来添补生活。山区农民只有挑柴、卖草、背黑炭，勉强维持极低的生活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平。再加上连年抓兵派款、苛捐杂税，刮尽民脂民膏，还要敲骨吸髓。广大贫苦的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动乱不安、饥寒交迫的困境；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全县只有三所中学（初中）、十所师范，在校学生不到五百人，整个县的教育事业，长期被少数几个还剥透顶的地主当权派所把持。他们大肆贪污教育经费，教学条件差，质量低。长期压制学生运动，禁锢学生思想，因此很多学生政治觉悟不高，学阀们误人子弟还自以为得计；人民群众的医药卫生条件更不堪言，全昆明县没有一所医院，每遇瘟疫流行，只有等死。如一九四二年缅甸的霍乱症，随着大批难民流传到云南，到处流行，病死的以不计其数。真是万户萧疏，惨不忍睹。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来不管人民的死活，旧社会的悲惨生活，实在是罄竹难书。历尽艰辛瘼难的昆明郊区农民，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深恶痛绝，日夜盼望着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他们起来斗争，早日得到翻身解放。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我解放大军压境，全省各族人民，在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领导的武装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终于得到解

放。今天，昆明郊区各族人民，虽然在政治上得到翻身，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有很大发展，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是，决不能忘记过去，应该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大道，努力开拓前进，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一九二七年前后的昆明县农民运动

为了切实弄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昆明郊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我曾专程拜访过原昆明县知识界的老一辈李实清（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毕希德(东陆大学学生)两位老人。据他们回忆提供的情况，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在当时中共地下省委领导下，来昆明市读书的一部份郊区青年学生，也曾经在家乡农村开展过农民运动。如南郊七甲的王凤、西郊干沟尾的张存义、夏窑的夏成林、车家壁的毕希德等，在农村串连一部份青年农民，组织农运小组。随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实行反革命大屠杀。当时伪省政府主席龙云，为了巩固他的反动军阀统治，执行蒋介石的罪恶意旨，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王凤就是一九

三〇年被捕壮烈牺牲。其余的有的被迫出走（如毕希德）、有的叛变投敌（如夏成林）。刚点燃的革命火种被扑灭了。由于昆明地区反动统治相对强化，因此，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恢复农村的党组织活动。前一段斗争历史虽然很短，可以说只是“昙花一现”，但也是烈士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应该为他们记下珍贵的一页，永远记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历史已经证明：革命的“野草”是永远烧不尽的，后来终究更茂盛的生长起来，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昆明地区在空前高涨的民主运动影响下，党在郊区的农民运动又开展起来了，直到最后胜利。

（三）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读书会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一直坚持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恶政策。因此，不到几年时间，祖国大好河山几乎被他葬送光了，最后躲到西南大后方，继续镇压人民、大发国难财。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投降卖国、腐败透顶的本质。所以众叛亲离，民心丧尽。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侵略军攻占缅甸以后，

继续向滇西进攻，龙陵、腾冲等地相继沦陷，云南省这个大后方也变成了前方。国脉民命危在旦夕，很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进步青年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反蒋的怒火燃遍全中国。当时的昆明，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学生为主，联合全市青年学生，还有进步教授和社会青年参加开展的抗日反蒋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昆明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公开和秘密的各种进步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一九四三年春，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邓贯一（即邓学元）同志为首，串联昆明市银行界的一部份青年职工，组织“读书会”。当时我在兴文银行，参加读书会的有我和傅国栋、王体铭等十几个同志。先后四年时间，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 学习革命理论，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先后学过《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献》、《延安一月》、《新哲学大纲》、《社会发展史》、以及《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订阅过《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每星期在自学基础上，组织讨论一次，有中心发言，思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分活跃，讨论非常热烈。另外，还请进步教授作指导，先后请教过李公朴讲解放区的教育；周新民讲《论联合政府》。还有一天晚上，在节孝巷某家不用照明的客厅里，听一位从解放区来的同志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斗争的形势，对大家鼓舞极大。以后读书会的成员，又分别串联发展新的读书会和其它群众组织，借以联系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壮大革命力量。

2、组织歌咏活动，先由我们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志，组成昆明市银行同仁歌咏队。后来吸收各界进步青年参加，发展为“昆明合唱团”，教唱革命歌曲。还请全国有名的音乐家赵沨、孙慎等同志指导，并带动发展其他的群众性歌咏组织，间接联系参加各种活动的进步青年更多当时。昆明音乐界已形成三股政治力量，即以我们“昆明合唱团”为核心，形成一股进步的政治力量，广泛传唱革命歌曲，唤醒亿万群众抗日反蒋的革命斗志；国民党三清团也出面欺骗一部份觉悟不高的人，搞一个合唱团。主要唱些粉饰太平的歌曲，甚至唱黄色歌曲，没有几天就垮台了；另外还有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唱诗班”，唱些《圣母颂》等宗教歌曲，

参加的人寥寥无几，实际上整个昆明歌坛，都是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的合唱团所占领。到处大唱《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延安颂》、《到敌人后方去》等，所有当时解放区流行的革命歌曲，昆明地区从城市到乡村广为传唱，给人民群众极大的鼓舞。有很多知识青年，都是通过参加唱革命歌曲，激发起革命的思想和斗志，因而走上革命的道路。曾记得有一次，我们十几个同志，带着印好的《古怪歌》、《五块钱》等讽刺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歌曲，到滇越铁路客车上散发教唱，深受群众欢迎。当我们在呈贡车站下车时，已经把车上的乘客都教会了，通过他们传唱到四面八方。

3．组织读书会成员深入农村作社会调查访问。一九四四年邓贯一、傅国栋和我，曾多次到昆明西郊明朗山区和呈贡海晏镇等地，了解农村人民的生活情况，查看昆明与安宁等县交界地区的地理交通情况，设想过万一抗战形势发展有必要在这里开展武装斗争，昆明附近山区与邻县山脉连绵，是游击活动的好战场。

4　印发传单揭露蒋介石的“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险恶阴谋。抗战后期，苏联军队在欧

州战场上全面反攻，节节胜利，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好转，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局已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武装，在敌后开辟广阔的战场，收复大量的失地；原来蒋介石消极抗战，一向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随时准备投降，但是，到一九四四年以后，眼看抗战胜利在望，就想阴谋独占胜利果实，恢复他在全国的反动统治。只恨手中可用的兵力不多，所以企图以抗战的名誉，大张旗鼓地宣传欺骗爱国青年参加“青年军”，以补充他发动内战的炮灰。地下党为了及时揭露和破坏他这狠毒的阴谋诡计，布置我们读书会，大量印发秘密传单的任务；当时以我在云南兴文银行之便，利用那里的工具，大量印发传单，通过各种方式，散发到省内外各地学校、机关、厂矿，使很多爱国青年不致上他们的当。后来社会上很多人，都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十万青年军”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5 利用合法身份揭露地方土豪劣绅的罪行。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国共和谈，并签定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当时

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也不得不搞点假民主欺骗人民。在各乡镇开展选举，成立乡民代表会。我把这一情况向邓贯一同志汇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来进行合法斗争的机会，借此在基层政权中做些工作，并同意我参加昆明县玉案乡乡民代表会主席的选举，最后在家乡广大人民支持下，掌握了这一合法职位，当即着手：首先清算前几任伪乡长张锷、李毅甲、刘正和国民党昆明县党部书记长张学仁，在玉案乡贪赃枉法、渔肉乡里的种种罪恶行为，他们多年来，借征兵、派款、征驱马代金等各种敲诈勒索的手段鱼肉人民。不几年时间都变成暴发户。张锷还霸占了几十亩乡苗圃，作为他的庄子；张学仁公开贪污明朗地区的全部积谷（公粮），叫农民全部送到他家里，还以“免送昆明、省下劳力”为借口，派各家各户帮他做白工，这些吃人的豺狼，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可是敢怒而不敢言。通过揭发，深深地激发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无比仇恨。清算工作正深入之际，国共和谈破裂，一九四六年全面内战即将开始，国民党统治区特务到处横行，七月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白色恐怖笼罩昆明。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也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仍然是他们可以横行霸道的天下，大肆反扑，进行垂死的挣扎，公然无耻地用血口喷人伎俩，向伪县政府控告我“思想左倾”、“有共党嫌疑”等几条莫须有的罪名。企图以此来摆脱他们被清算的困境。实际上他们抓不到什么把柄，当时伪县政府也有暗地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他们把情况告诉我，当即据理力争，严词予以驳斥，最后以不了了之。鉴于当时总的形势变化，邓贯一同志同意我主动辞去乡民代表会主席职务，银行方面也由于我们是银行同仁会的骨干，抗战胜利后，曾参加领导过反对裁员减薪的银行界罢工斗争，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金饭碗的风波”。所以兴文银行决定把我和涂超江、那学昌三个，他们认为是“主要的人物”分别调离昆明。邓贯一同志也同意我暂时避过风头。就此，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昆明，到四川宜宾兴文银行。刚开始的斗争也就暂时停下来了，从这一段初步斗争的经验说明，对反动统治政权存在任何改良的幻想，都是错误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亿万革命群众起来，彻底推翻他们的

反动统治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

（四）中共昆明郊区特支和昆明县工委时期的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一九四八年昆明“七·一五”反迫害、反饥饿学生运动以后，接邓贯一同志的信，要我很快回昆明工作。当我立即辞退宜宾兴文银行的工作返昆时，正值卢汉在南屏街为“中央银行事件”实行大屠杀之后不久，几年不见的春城笼罩着一派肃杀之气，一到昆明就同邓贯一同志联系上，并要求他让我到游击区工作，当时他知道中共昆明市委决定要开展昆明郊区的农民运动，所以他决定把我留在昆明工作，并要我写一份自传，同意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具体给我布置在昆明郊区工作的任务，要我回到家乡在群众中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个别组织串联，组织地下农民协会。随后不久，交给我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学习后要我写一份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本人的志愿，并表示同意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随即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份，向他汇报工作之后，他郑重地告诉我“上级党组织已同

意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从那天起就把我的党的组织关系转给万荣仁同志联系。随后万因故离开昆明，又把我的关系转给王维彩同志领导。从此，我就在中共昆明市委领导下工作。

昆明郊区在党领导下广泛的农民运动，从一九四八年“七.一五”前后就开始了。当时党动员一部份昆明郊区学生回到本地进行秘密活动，各大、中学校革命青年响应党“到农村去”的号召，利用假期，纷纷组织到郊区进行宣传工作，组织地下农会。云南大学学生到大板桥、师院学生到官渡，云大附中学生到北郊龙头村一带，昆一中(原昆华中学)学生到西郊红庙、土堆、梁家河等，各地的工作开展得很好。串联一部份知识青年和大批农民积极分子，为后来的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全国解放战争到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垮台已成定局，蒋介石还想利用云南的特殊地理位置作为他最后垂死挣扎的基地，然而云南各地在滇桂黔边区工委领导下，游击斗争蓬勃发展，不少县城和广大农村已陆续解放，对昆明已形成

包围之势。在此情况下，中共昆明市工委决定成立昆明郊区特支加强领导，全面开展昆明郊区的农民运动。通过地下农会的组织，把昆明市的地下斗争与邻近游击区联成一片，以便迎接昆明和整个云南全省的解放。

经过一段时期工作以后，昆明郊区特支于一九四九年夏才在昆一中一个学生宿舍正式秘密宣布成立。会上由王维彩同志主持，先办理了陆介福、汪润的入党宣誓，随后宣布支委的分工，特支书记王维彩兼，付书记陆介福，组织委员施万惠，宣传委员汪润，并决定：东郊（包括北郊）施负责，西郊陆负责，南郊汪负责。在前一段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定期在不同地点联系。至此，把在昆明读书的学生到郊区进行地下活动的党和“民青”关系，如西郊的王禄意、段金祥、任正书、倪汉东、叶芃，南郊的杨云龙、蔡瑛、赵永熙，东北郊郭忠义、马荣柱、李友明等同志的组织关系转由郊区特支领导，按分工分别进行联系，很快推动了郊区农民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昆明各学校的学生，也经常到郊区农村举行文艺晚会，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